西式民主“神话”，在西方也快讲不下去了

评判一种民主好不好，最朴素也最有分量的标准，永远是它能不能持续给民众带来稳定的生活、确定的预期和向上的希望

社评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本国民主运作的满意度正急剧下滑：法国有69%的民众对民主不满意，西班牙为68%，意大利为62%，波兰为47%，美国为69%。事实上，不只皮尤，益普索、盖洛普等多家西方知名民调机构近年的持续追踪，都指向同一清晰趋势：西方民众对本国民主运行状态的不满，正从局部情绪演变为普遍心态。

这种不满，不只体现在民调数字上，更是西方多国街头正在上演的现实。对西方世界来说，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有的饱受政坛高层频繁更替困扰，有的深陷移民融合难题，有的在能源转型阵痛中忧虑传统产业不断萎缩，有的因日益激化的社会对立焦头烂额。民调数据清晰呈现出共通的民意走向：越来越多人不相信政府能真正代表普通民众的诉求，认为现有政治框架已无力推动实质性变革。反腐败、强化问责、提升公共政策的回应性、让普通人的声音被真正听见，已成为西方民众跨党派、跨阶层的共同诉求。

不少人曾以为，投票就是民主的全部：只要遵循选举程序，结果就具备正当性，民意自然会进入政策。但如今，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意识到，投票更像是一种周期性仪式。几年一次的选择，并不能保证自己在两次选举之间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经合组织今年的相关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相信投票能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但仅有31%的人认为普通人能在日常政治决策中发出有效声音。当怀有诉求的民众发现，自己投出的选票常常换不来政策回应，对“民主”的好感，自然会在现实面前不断消减。

当前一些西方精英围绕“民主怎么了”的讨论，常常滑向两种片面解释：要么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民粹主义者的煽动，要么把民众的不满说成是对民主“失去了耐心”。这两种说法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国家民众对民主的不满并非源于误解，而是现行民主制度未能有效回应社会诉求、契合社会需要。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也曾经历一段社会平稳期，彼时西方民主制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所谓“历史的终结”，而是依托于西方在多个领域的垄断优势。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资本流动性增强、产业布局重组，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再分配上的实际空间被系统性压缩。与此同时，制度性腐败对政治过程的渗透日益加深，西方民主制自身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

从根源上看，西方民众的不满，主要不是对民主价值本身的否定，而是对西方民主实践深感失望。西方一些政党的政策制定日益向资本利益倾斜，普通民众的生计问题被搁置一旁，选举政治逐渐沦为不同精英阵营之间的权力博弈，党派恶斗、否决政治、政策摇摆成为常态，政治承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持续拉大。来自社会基层的不满，正在不断拷问西方民主制的现实适配性，也为未来西方政治的走向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伏笔。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西方世界对“民主怎么了”的反思真正有益的启示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形态，也不存在可以脱离本土土壤、脱离民众真实需求凭空运行的民主模式。如果长期把选票当成民主的全部，把党派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用口号宣传代替实际治理，再光鲜的制度外壳，也会在民众一次次的失望中被抛弃。

评判一种民主好不好，最朴素也最有分量的标准，永远是它能不能持续给民众带来稳定的生活、确定的预期和向上的希望。可叹的是，西方一些政客和舆论至今仍在将民主当作对外输出的政治工具，在国际上强行划阵营、搞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做法不仅无法真正回应本国民众的诉求，更会不断加剧民主与现实的脱节，让西方民主的公信力在国内民生困境与对外霸权行为的双重消耗下持续流失，最终陷入内外交困的信任危机。▲

密集“穿梭外交”展现中国大国担当

丁　隆

中方多位特使、特代将于近期分赴中东、红海及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展开穿梭访问。其中，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将访问伊朗、阿曼、沙特，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将访问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埃及，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将访问厄立特里亚。中方此次在同一时段派出三位特使、特代奔赴热点地区开展穿梭斡旋行动，是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又一次具体实践，而且传递出清晰信号：面对持续延宕的地区冲突，中国主动走到当事方中间劝和促谈、缓局降温，充分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

当前，中东与非洲之角已来到多重危机叠加的脆弱关口。海湾地区安全对峙尚未降温，还存在新一轮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道的动荡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非洲之角部分国家的内部矛盾与跨境分歧相互缠绕，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迟迟得不到根本缓解，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地位一再被边缘化。这些问题相当棘手且彼此关联，海湾军事对抗博弈牵动地区安全格局，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道安全关乎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安全，非洲之角局势又和红海沿岸国家稳定相互交织，需要整体推动、统筹解决。中方在危急时刻推出全方位斡旋行动，有利于缓局降温，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可以说，中方密集斡旋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长期以来，外部势力在这片区域拉一派打一派，动辄挥舞单边制裁的大棒，通过发动战争谋霸、牟利，让本就复杂的局势不断升级，面临失控风险。当前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能有真正中立、负责任的大国站出来，把各方拉回谈判桌。冲突不断延宕凸显斡旋公共产品不足的困境，大国或深度卷入，或自顾不暇，地区斡旋方虽积极努力，但受制于分量不足、力度不够，未能取得重大斡旋突破。中方此时密集出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亟需的公共产品，也为地区斡旋方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这个动荡时代宝贵的和平稳定力量。

中方斡旋行动深受地区国家欢迎。中国的斡旋外交不谋求私利，不把解决方案强加给冲突各方，因而受到冲突各方和地区国家普遍欢迎。中国在中东和非洲之角没有地缘政治私利，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阵营对抗，也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地区国家。从中方提出系列中东和平倡议，到在安理会等国际场合多次阐明建设地区和平的主张，再到支持“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事务的一贯立场，中方所有外交行动的出发点，从来不为在地区棋局里卡位置、分蛋糕，而是真正站在地区国家一边，支持它们提高战略自主性，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既能同沙特、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保持长期友好合作，也能同伊朗保持正常沟通，同时和非洲之角各国都保持着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不偏不倚的立场和真心实意的劝和为中方斡旋外交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地区国家普遍对中方发挥积极作用寄予厚望。

中方是中东斡旋外交的行动派，经验丰富，成果丰硕。2023年，在中方主持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实现和解，其遗产仍在为中东冲突降级降温持续发挥正面作用。但必须看到，当前的局势远比两年前更加复杂，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从局部冲突蔓延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不同热点问题之间的绑定程度更深，各方的安全关切也更加敏感多元。中方此次密集斡旋行动并不期望一次性解决所有根深蒂固的矛盾，也不会开出不切实际的和平时间表。其价值在于局势最危急、最易因误判而升级的时刻，重新打通沟通渠道，把缓局降温作为优先目标，给谈判一个窗口，给和平一个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中方不仅走出去开展斡旋，同时还接待阿曼、沙特和伊朗的元首和高级安全官员来访。

世界正将目光投向中国，期待北京成为斡旋中心、和解之都。中方会认真对待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和期待，为促进中东和非洲和平稳定奔走，为化解冲突呼喊，为推动实现世界长治久安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日本“3.0版防务计划”必遭反噬

庞中鹏

据外媒披露，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正考虑将2027年4月起的5年防卫建设预算大幅提高至70万亿到80万亿日元（约折合4400亿至5000亿美元），比现行计划增加近一倍。

如果说，战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与防卫费占GDP 1%以内的底线是“1.0版本”，而岸田文雄时期确立日本防卫费在2027财年增至GDP的2%是“2.0版本”，那么到高市早苗时期拟将预算再翻倍、谋求大规模无人作战系统，则意味着日本防卫计划正加速向更具进攻性的“3.0版本”演进。可以说，日本正以惊人的速度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

日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有着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其一，美国长期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日本试图借此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在“第一岛链”发挥更突出的军事作用。其二，日本右翼势力长期炒作所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刻意渲染“中国威胁”，以此作为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借口，企图将国家彻底绑上“再军事化”的战车。其三，为谋求非对称作战优势，日本正将巨额资金倾注于前沿作战领域。其四，是打造“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闭环。日本财界主要大财团，如三菱重工与川崎重工等，长期推动政府将防卫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支柱，这些军工企业急需大量订单以扩大军品业务规模。而日本政府为呼应军工财团要求，试图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通过“以经济之名扩军、以扩军反哺军工”的危险循环来刺激经济。

环球观察家

然而，日本这一穷兵黩武的计划正面临严峻的现实制约。首当其冲的是日本脆弱的财政与面临的高债务危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56.7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强行扩军无异于饮鸩止渴，极易引爆系统性债务危机。

其次，扩军严重挤占民生资源。为筹措军费，日本政府不惜削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并计划开征“防卫特别所得税”，这引发了民众“要大米不要武器”的强烈抗议，超六成受访者反对增税扩军。毫无疑问，日本的大幅扩军必将带来强烈的地缘反噬效应。

日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对国际局势的消极影响是深远且灾难性的。一方面，这将彻底打破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点燃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导火索。日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不仅严重冲击战后国际秩序，更可能将周边国家裹挟进冲突的漩涡。

另一方面，日本将台湾地区与自身安全强行挂钩，配合外部势力搞阵营对抗，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这种以邻为壑、制造对抗的行径，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陷入地缘政治的险境，重蹈历史覆辙。

历史殷鉴不远，穷兵黩武必遭反噬。日本防务计划向“3.0版本”演进，绝非单纯的防卫政策调整，而是国家身份向“战争体制”质变的危险信号。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日本唯有深刻反省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停止军事扩张，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的信任，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应有贡献。▲（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